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批准号：00BZX02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哲学文化资源的

当代开发利用问题研究

项目负责人
杨翰卿

二〇〇二年十月

批准号：00BZX023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传统优秀哲学文化资源的 当代开发利用问题研究

项目负责人：杨翰卿

课题组成员：徐纪律 柳昌清 徐初霞
唐喜政 魏银堂

内 容 提 要

这篇研究报告《中国传统优秀哲学文化资源的当代开发利用问题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梳理总结了我国 20 世纪对于传统哲学和文化资源的各种有代表性的文化理论观点，全面深刻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创新关系，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见解，对于如何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发展先进文化，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项目上篇认真总结了 20 世纪关于对待和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资源的各种思想观点的理论得失。首先对立足于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及其衍化形态进行了述评。认为中体西用论具有传统的立场，卫道的态度，半开放的心态，折衷的方法等本质和特点。立足传统与立足现代特别是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不同。立足传统不可能积极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传统做出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对待、合理的转化、有效的利用。其折衷调和的方法完全是不科学的。50 年代就如何对待中国哲学遗产问题冯友兰提出了被称为“抽象继承法”的观点，从理论思维的层面看，哲学史研究中要注意继承历史遗产的“抽象意义”的思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就这一方法本身来说，是形而上学的，作为对于弘扬和开发利用中国传统优秀哲学文化的总体方法，并不足取。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儒学复兴”思潮，总体上基本没有脱出“中体西用”论的窠臼。在文化立场、思想态度、基本心态等方面，与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体西用”论，没有实质差别，甚至说是向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体西

用”论的复归。在方法上，“中体西用”论是折衷调和的，“儒学复兴”论则更近于形而上学。然后研究了反对传统的西化思潮。认为西化思潮一直是中国近现代中西冲突、古今对立的另一极。是以民族文化虚无、心仪西方文化，反对封建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现代化等于西化为主要的基本特征。其极端思潮是“全盘西化”论。20世纪80年代的“西体中用”之说，实质仍为“西化”。这一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干扰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正确选择，除了给人们留下深刻的省思之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背离中国的实际的。这一思潮肢解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对中国先进文化正确方向的选择起到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依靠这种中西对立的僵固思维模式，对古今、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根本不可能给予正确解决。其全盘地否定传统、反对传统，与固守“国粹”、“中体西用”一样，在文化立场和态度上都是一种极端化、片面化的倾向。接着研究了“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和“创造性转化”等主张。这些观点表现出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亲和与肯认而又不固守，既对西方文化不全盘认同和照搬亦积极吸纳和融摄的态度。这些见解大多是近些年来活跃在海外的华裔学者所持有，在一定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文化观有某种认同。最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综合创新文化观。指出这是20世纪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今中西问题在文化上的一种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表现出了完全积极健康的文化心态和开放的立场。这种主张从文化立场、政治立场、文化心态、思想学术态度、思想方法研究方法等，都明显地优于极端的西化论和国粹论，也优于折衷调和的“中体西用”论和“西体中用”论，不仅超越了欧洲中心论和华夏中心论的偏见，也超越了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在科学性、先进性、完备性上，是其它种种文化理论和主张所不可与之同日而语的。“综合创新论”的落脚点在于“创新”。这种“创新”之所以是辩证的、综合的，就在于其运思的时空前提或资源前提是

“古今中外”，这就需要“综合”；其运用的工具前提或方法前提是“批判继承”，这就内蕴着“创新”。这种在“综合”基础上的“创新”，标志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既充分继承、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化资源，又具有真正超越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现代品格。这种“综合创新”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所以，“综合创新”的文化主张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方针和文化政策完全相一致，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相吻合。当然，“综合创新”论在文化建设的实践中还有进一步探索、总结、充实的理论空间。

中篇重点研究了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判别及科学对待问题。首先阐明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理念，坚持批判继承、创新发展，是正确分析鉴别并科学对待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首要原则。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代表的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审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形成了科学的批判继承文化方针，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对于我国古代创造的灿烂文化，提出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批判继承的思想，并具体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古今中外法”、“双百”方针、“二为”方向等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方向与科学的理论指导。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基础上，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知行统一”等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形式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继续坚持并在实践中发展批判继承的方针，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规定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处理好古今中外关系是这一文化建设指导方针的基本内容。江泽民同志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或组成部分，就是大力弘扬优秀文化传统，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强调文化创新。江泽民强调“我们党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尤其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强调结合时代精神和新的实践、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突出强调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积极进行理论创新、文化创新。使我们党的批判继承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注入了新内容，富有了新的理论生命和实践指导作用。

其次论述了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实践标准。阐明根据现实的实践要求分析鉴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原理所规定的。坚持以现实的实践为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标准，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具体化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践，还表现出实践标准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特征，是实践标准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辩证统一。将这些方面统一起来，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当代开发利用，就是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既坚持时代性标准，又坚持民族性标准的理论成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先进文化的结晶和代表，又凝聚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优秀传统。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坚持实践的时代性

标准和民族性标准的必然要求。

下篇着重研究了新世纪进一步开发利用好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问题。提出在新的世纪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分析对待、批判继承、创新发展，应当从抽象转入具体，分别采取继承性弘扬、融合性创新、剔除性转换、矫正性纠偏、批判性重构等方法和途径。继承性弘扬，即对于传统哲学文化中那些能够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精神（如自强不息等）的大力弘扬；融合性创新，指对那些具有民族特征、可以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的遗产，在保持民族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其他文化的合理成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途径，融会贯通，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剔除性转换，指对那些具有合理的内核但同时包裹着因受旧制度、过时的生产生活方式、狭隘的眼界等限制而形成的错误观念或过时观念（如“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从中剔除掉迷信、错误、陈旧的成分，保留其尚有生命力的意义，并加进新的时代内容，将其改造成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哲学文化成果；矫正性纠偏，即对传统哲学文化在重大关系问题上的主次颠倒或轻重颠倒，认真地加以矫正，以保证中华文化前进发展的正确方向；批判性重构，是指对于妨害科学和民主健康发展的文化传统（轻视科学认识的相对短视文化意识、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大分析批判的力度，并注意吸收现代文明的成果，根据中国社会和历史的特征，重新构建适合时代要求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和认识系统。

目 录

内容提要	(1)
上篇：20 世纪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资源 的主要理论观点（或思潮）述评	
第一章 立足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及其衍化	(4)
第二章 反对传统的西化思潮	(23)
第三章 “以传统批判现代化，以现代化批判传统”和“创 造性转化”等主张	(28)
第四章 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32)
中篇：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判别	
第五章 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 ——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的文化建设方针	(40)
第六章 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实践标准（一）	(56)
第七章 判别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实践标准（二）	(68)
下篇：新世纪进一步开发利用好中国优秀 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	
第八章 继承性弘扬	(88)
第九章 综合性创新	(95)
第十章 剔除性转换	(99)
第十一章 矫正性纠偏	(104)
第十二章 批判性重构	(108)
附录 1：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换	(112)
附录 2：Modern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122)
后记	(132)

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资源的 当代开发利用问题研究

江泽民同志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一切优秀的文化,必须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增强感召力。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党和人民从五四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努力繁荣先进文化,把亿万人民紧紧吸引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伟大旗帜下。”这就全面而深刻地揭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精神文明,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党和人民的革命文化传统、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继承、发扬、创新的关系,是我们应当确立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张岱年先生说,21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一方面继承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要发扬优秀传统-----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最后一句话指出‘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我们中国的工人阶级如果只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恐怕就不够了,中国工人阶级也应该是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继承者。”(张岱年:张允熠著《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序言,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这也表明进一步开发利用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资源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文化的深刻意义。

上 篇

20 世纪对待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 资源的主要理论观点（或思潮）述评

20 世纪始终贯穿着文化问题的大讨论，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中西文化激烈的冲突碰撞，形成了传统、西化、马列三种基本的文化立场，并由此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各自不同态度，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如中体西用、抽象继承、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儒学复兴、全盘西化、创造性转化、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等等。反思这些理论观点或成果及其实践，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新世纪的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一章 立足传统的中体西用论及其衍化

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体用之争，到了近代衍变为中西体用之辨。其中“中体西用”论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流行发展成为时代思潮，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20世纪，这种思潮仍表现出各种不同面目，薪火不绝。20世纪50年代，冯友兰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倾心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于八、九十年代呼声渐高的“儒学复兴”论，路数不同，情况复杂，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新形式的“中体西用”论，或者是以“儒学复兴”之名实现“策略改变”、“话语转换”，从而达到某种“意识形态企图”。如此等等。

一、中体西用论

1、20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背景

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总体上是承19世纪下半叶中体西用论的余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心态、方法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只是在理论上进入到了更为深入的层面，这是由20世纪仍然是面对中西文化碰撞、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即中西古今问题所决定的。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被迫打破闭关锁国的局面而开始走向世界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从古代（中世纪）走向近代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中，一些固守传统、封闭僵化、拒西方文化于门外的思想自然很有市场，自不待言。同时，一些有识之士面对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丧权辱国的结局，证实了外强我弱的实情，于是如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制夷”的主张，开了“开眼看世界”之先，但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卫中国封建制度之“体”，可视为中体西用论的初萌。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可以说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明确表述。此后，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相继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主张。如王韬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韬园尺牍》卷四）还说：“器则取诸西国，道

则备自当躬。盖万事不变者，孔子之道也。”（《韬园文录外编》卷十一）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筹洋刍议·变法》）郑观应认为，“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凡例》）早期改良派以“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观点以表明他们改良以卫道的思想，其中体西用的传统立场和态度同样是明显的，但其心态与鸦片战争时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都显然共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他们的这种思想，特别是变器不变道的思想，很快被洋务派接过去，成为他们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理论纲领，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张之洞明确地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 203，第 19、22 页。）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观主要是对抗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和革命者的政治改革的，侧重的是中体卫道的传统立场，这与早期改良派有所不同。1896 年 4 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匡时策》中，具体使用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表述，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来看，当时的各派知识分子，凡是讲西学、谈时务的人，差不多都是赞成中体西用论或受到它的影响的。即使资产阶级的维新派，除了严复、谭嗣同等少数人有明确批评“中体西用”的言论外，他们大多数是一方面批判“变器不变道”的观点，一方面又附和中体西用论。如康有为就曾主张“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梁启超传》）。

不难看出，“中体西用”作为整个 19 世纪后半期的时代思潮，其传统卫道的立场基本上是相同的，对于西方文化差不多也都是半开放的心态，只是在采西学、主西用方面有了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进展。20 世纪的中体西用论在思维结构上根本没有改变，所不同的是于西用在程度上进一步深入到了精神文化的层面。

2、20 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内涵

尽管是承 19 世纪下半叶中体西用论之续,但 20 世纪的中体西用论更多的不是停留在这一理论主张的抽象论证上,而是具体地发挥、发扬、发展、深化中体西用论。有的代表人物例如贺麟甚至在口头上还反对中体西用,认为无论是中体西用论、全盘西化论还是国粹论,均偏激、绝对而武断,但另一方面他又积极主张儒化西洋文化、华化西洋文化,认为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中西文化的融和问题,本质上即是“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仍然贯彻的是实际上的中体西用论。20 世纪中体西用论的主要代表是现代新儒家。

“五四”以后的梁漱溟是东方文化派的主要代表,他提出的“三路向”的文化观即是一种新的中体西用论。他指出,西洋文化以“意欲向前”为根本精神,中国文化以“意欲调和持中”为根本精神,印度文化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根本精神。西洋文化“意欲向前”的根本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塞恩斯”即科学,另一是“德谟克拉西”即民主。“意欲向前”又叫做有对:即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把自然和社会当作改造的对象看待。西洋人走的是“向前要求的路向”。这种路向有其成功的方面,那就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在精神上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他认为时至今日西洋文化已走上穷途末路,将随着人类生存问题的解决而告过时。由此他断言,西方文化不得不让位于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根本精神在于意欲、生命努力使自身与环境相调和,以谋求与环境达成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梁漱溟一方面充分肯认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与民主两大精神,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必须坚守和弘扬自己传统的价值,因为西方文化正在折向中国的一路,中国文化复兴的机运将马上到来。梁漱溟将中国文化认定为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认为中国文化的价值必将得到普遍承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与片面地固守传统者显然不同,更与唯科学主义、西化论者根本相异。然而在最终结论上,梁漱溟毕竟认为未来的世界文化应该

是西方的方法（科学与民主）与中国的态度（传统的精神价值）相结合，在中西文化的评判方面，虽然在形式上避开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之见，实际上仍未脱出“中体西用”的藩篱。贺麟就曾明确地指出梁漱溟是“隐约地暗示着东方的人生态度要深刻完善。”“他一面重新提出儒家的人生态度，而一面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亦未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圈套。”（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2页。）

1935年1月，上海“10教授”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揭出了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的旗帜。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论，按《宣言》的说法，即他们既反对守旧复古，也反对全盘否定古代的“中国制度思想”，主张“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他们又反对全盘西化，认为“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显见，此论在语言形式上多为空言虚语、笼统含混，或者貌似辩证，其实其理论基础仍是中体西用论，这是连反对和认同此论者均持的看法。胡适就批评它“是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最新式的化装出现，说话是全变了，精神还是那位《劝学篇》的作者的精神。”潘光旦也差不多是将“中国本位”与“中体西用”划了等号的。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包括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诸位新儒家。冯友兰建立了“新理学”哲学，贺麟构建了“新心学”哲学，熊十力的是“新唯识论”。他们彼此之间的哲学思想尽管有很大差异，但其中体西用的精神方向却是相同的。这里以冯友兰为例略作说明。首先，冯友兰在文化的区分问题上，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由开始认为是东与西的区别，转而认为是古与今的区别。就当时而论，西方文化已经因工业化的实现而实现了从古代类型到现代类型的转变，而中国文化尚处于转变的过程之中。因而，解决中西文化矛盾的途径，不在于固守传统，也不在于全盘西化，而在于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使自己的文化从古代类型转入现代类型。其次，在哲学或思想文化比较问题上，冯友兰认为从内容到方法，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都有其“益道”、

“损道”和“中道”几种类型，也都有其“正的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和“负的方法”（直觉主义的方法）。“我们比较和研究中国和欧洲的哲学思想，并不是为了判断孰是孰非，而只是注意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

“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9页。）复次，在哲学和文化的未来发展上，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可能有所贡献。因为，冯友兰展望未来的哲学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而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恰恰就是道中庸而极高明、入世间而出世间的。这种哲学和文化，较之于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虽不甚适宜于现代工业化社会，但对于人类未来社会来说，却大有裨益。再次，从冯友兰新理学的哲学实践来看，是用近代的逻辑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是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新理学对于宋明理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利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加以说明，这对于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是有益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台湾兰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66页。）用西方哲学逻辑分析的方法阐释说明中国哲学，可以说同样是实际上的中体西用。

50年代以后的当代新儒家学者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为标志，形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的新面目。他们呼吁西方应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当下即是的精神”、“圆而神的智慧”、“温润而恻怛的悲悯之情”、“天下一家的情怀”、“向道德中心的价值系统的回归”等。其后他们讨论阐发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返本开新——返传统儒学之本，开民主、科学之新。他们认为儒家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也是人类的最高智慧，由此内圣心性之学开出民主、科学的外王事业乃是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必然的内在要求。他们毫不隐讳这是一种中体西用论。

3、20世纪中体西用论的理论实质

综观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尽管各自的理论阐述有不小差异，但就其

共同的本质和特点来说,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传统的立场,卫道的态度,开放的心态,折中的方法。文化立场是传统的,就是说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约而同的有着共同的价值认同,但它又不同于国粹论者对传统一味的僵化固守,只是认为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人文精神对于中国社会走向近现代乃至对于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并非不有重大意义。正由于此,特别是在近现代中国处于民族危亡、文化危机、西学冲击的背景下,更决定了20世纪的中体西用论者基于传统的卫道态度。但是他们又都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已不可能再走回头路,或者停留在旧时代,也由于他们感受到了西方文化中的积极精神,于是便自觉形成了前此立场态度下的一种开放心态,尽管其开放的视野、目标、程度有所不同,而目的却是一个,即求西用以固中体。这样,在方法途径上采取折中调和的中体西用则是比较顺理成章了。

我们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唯有在心态上不同程度的开放性特征,似可在一定意义上给予肯定,传统的文化立场、卫道的基本态度则可批评,折中调和的方法更不足取。因为,立足于传统与立足于现代特别是立足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显然根本不同。同时,传统又有优秀的和非优秀的、好的和坏的等分别,立足于传统不可能对此加以正确的区分,因此不能积极地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践,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对传统做出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对待、合理的转化、有效的利用。其折中调和的方法更非科学的方法,结果只能是文化上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矛盾混杂、支绌灭裂的杂拌和怪胎。对于中体西用的文化观,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52页。)张岱年指出,中体西用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一种“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方式”,“在各民族文化势将融会成统一的世界性文化(当然这并不排斥各民族文化仍具有民族特色)”的情势下,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合时代潮流的”,中体西用论“属于调和折中类型,总体上是错误的”。(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